作爲方法的關鍵讀者

——王士禛的李商隱詩歌接受及其文學史意義*

吴留營

提　要

王士禛“神韻説”奉王孟爲圭臬,似與義山詩涇渭兩分。故而義山詩接受史上,王氏往往被忽略。但從虚與實的詩學範疇來看,義山的朦朧詩與王士禛的神韻詩,都以寓有於無、化實爲虚的方式呈現,不直切實事;富含言外之意,徒追其字面則往往無人、無事、無跡可尋。基於審美理想的交集,王士禛作詩填詞,以義山詩爲效法對象,這在其早期和晚年的創作中尤爲突出。外放揚州期間,王氏聚集同好,以《倚聲初集》的編纂爲契機,在豔詞創作熱潮中,開展義山詩品評活動。作爲關鍵讀者,王士禛在詩詞、詩話、詞話等著述中反復提及李商隱。這些文獻因王氏詩壇盟主的地位,産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 李商隱　關鍵讀者　王士禛　再接受　清初詩學

在李商隱(字義山)詩歌的接受史上,清代是濃墨重彩的時期,清初尤其是熱度提升的關鍵期。當前學界對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圍繞朱鶴齡《李義山詩

---

*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的意見建議。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漢詩史”(19ZDA295)階段性成果,獲得國家留學基金資助。

箋注》、吴喬《西崑發微》等專書,以及虞山詩派、婁東詩派等相關詩論,成就斐然。[1] 明清之交至康熙時代,詩學大家錢謙益、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漁洋山人)先後主盟詩壇。錢氏推動了李商隱關注熱潮,前學論述已備;王氏持何立場? 亦值得追問。王士禛向以神韻説爲學界熟知,但漁洋詩學絶不是一個"神韻"可涵蓋的。[2] 王氏曾沉浸義山詩,措意頗多。然在現有李商隱接受史研究的成果中,王士禛地位未顯乃至缺位。推究緣由,王氏詩話中提到李商隱的條目較少,恐爲肇因。值得指出的是,王氏詩詞、筆記等各種著述中涉及義山之處實則浩繁可觀。王氏在李商隱接受史研究中隱没的更深層次原因,在於諸家對"接受"一詞的理解未盡一致。這甚至是當下國内學界圍繞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的重要歧異所在。

回到歷史語境,錢謙益在爲王士禛詩集題序中,即評價道:"貽上之詩,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時之作,惻愴於杜陵;緣情之什,纏綿於義山。"[3] 指出王士禛詩歌審美風貌接近杜甫、李商隱。此説與當前王士禛在李氏接受史上的缺位現象頗爲齟齬,吸引筆者在前學基礎上"接著談",探討王士禛是否足以成爲李商隱接受史上的關鍵讀者,包括其跨文類的接受方式、共時和歷時語境中的地位如何,同時豐富漁洋詩學的審美意涵。

一、效義山體與多元詩學取徑

清初李商隱詩研究、接受熱潮的興起,錢謙益有倡導之功。誠然,錢氏爲釋道源《義山詩注》、吴喬《西崑發微》作序,有力反駁了兩《唐書》設定的、長期流行的貶抑李商隱的基調,錢龍惕《玉溪生詩箋》、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注》也都

1　諸如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 年),米彦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李宜學《從〈無題〉詩論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對朱鶴齡〈李義山詩集注〉的接受》(《東亞觀念史集刊》,2017 年 6 月,第 12 期)等。

2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頁 676。

3　錢謙益:《王貽上詩序》,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卷 17,頁 765—766。

是錢謙益授意而爲。如此，清代李商隱接受史上，錢謙益堪稱“第一讀者”。然而，有清一代，錢氏著述因長期遭受禁毀，公開傳閱、徵引成爲禁忌。相較於箋注者，真正要掀起李商隱詩歌接受的熱潮，非有詩壇名流的推促不可。接續錢氏成爲詩壇盟主的王士禛後來居上，王氏對李商隱其人其詩的評述話語，流傳既久，沾被亦廣。

早在順治十三年（1656），王士禛有《無題戲效温李體》五言長詩數十韻。“洞房交玉翦，團扇拂金鵝”，“愁妝雲作鬘，巧笑玉爲瑳”等語，[4] 頗爲纏綿悱惻，韻致不讓温李。順治十六年，再作《無題同彭十駿孫作》八首，以七律寫就，體現王氏在此領域不拘一格的才華。組詩第一首開篇即道：“雲母屏風玉女扉”，[5] 圈畫閨閣場景，設定香奩基調。“雲母屏風”、“玉女扉”是義山詩中的經典意象。李詩名篇《常娥》首句即是“雲母屏風燭影深”，[6] 李詩“寒氣先侵玉女扉”、“玉女窗虚五夜風”，温詩“玉女窗扉報曙鐘”也可見慣熟之用。王士禛組詩中“不禁團扇掩啼妝”、“深閨午夜待牽牛”等語，皆是香奩詩當行本色，自不待言。王氏“已落猶開豆蔻枝”句出李義山詩“已落猶開未放愁”，“顛學吴綾印口脂”句出韓偓“口脂易印吴綾薄”詩，[7] 可窺見這一時期王氏的學詩取向。當然，化用前人字句入詩，無論是從模仿還是從接受角度看，都是淺顯的、尋常的現象。不容忽視的是王士禛有意如此漫淺地效法李商隱，似有唯恐他人看不穿的用意。這在李詩“托興説”被廣泛認可的語境中值得注意。而且，所謂襲貌取神，襲貌乃必經之路。

李商隱《無題・重帷深下莫愁堂》中有“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句，[8] 用古樂府清溪小姑、獨處無郎的典故。王氏《無題同彭十駿孫作・其七》也將此典化入句中，可謂是由表及裏的仿效。所不同的是，李詩以“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作結，有自知無謂、聊以自嘲之意；而王詩則强調

4　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年），册 1，頁 176。
5　同上，頁 235。
6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蔣凡標點：《玉溪生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卷 3，頁 717。常娥即嫦娥。
7　韓偓著、陳繼龍注：《韓偓詩注》（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年），卷 4，頁 374。
8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蔣凡標點：《玉溪生詩集箋注》，卷 2，頁 458。

"何日渡江雙桂楫",[9] 雖未渡江,但念念在兹,且爲之設想路徑。王氏《無題同彭十駿孫作・其六》結句也寫道,"方山亭下江津水,自此蘭橈逐斷鴻"。雖然戟門深鎖,鴻斷魚沉,但詩中女子有心畫眉整妝,駕舟追逐。時僅 26 歲、正汲汲仕進的王士禛與久居下僚的李氏同寫無題詩,使用相同意象,同樣以閨閣相思抒發不遇之意,然餘韻有别。反觀李氏其他《無題》之結句,"更隔蓬山一萬重","一寸相思一寸灰",雖有相思但幾近絶望。縱使也有"青鳥殷勤爲探看",但仍不及王氏"渡江雙桂楫"、"蘭橈逐斷鴻"來得積極主動,顯露化相思爲行動的進取心態。儘管讀者可以如此解讀,可以如此填補詩中的空白點,但無論是李商隱還是王士禛,無論是題目中還是詩句裏,都未道破,不在詩中留下任何與現實勾連的線索,乃至無人、無事、無跡可尋。比一般詩歌更爲含蓄蘊藉,這或許正是李、王一脈相續的無題詩的魅力所在。值得一提的是,在順治時代王士禛肆力於無題詩之時,恰也是其神韻詩論的初創期。[10] 王氏"神韻説"的創立過程中,也不排除接受了李詩之啓發。乾隆朝,靳榮藩評價王氏詩"於太白爲近,而參以右丞之超逸、義山之蘊藉"。[11] 靳氏爲吴偉業詩作注,對讀吴王二家詩,所論不無依據。

由此可引出王士禛早期詩學宗尚的討論。王氏主盟康熙詩壇數十年,推尊王孟一派,倡言司空圖、嚴羽之説,其後學者多以"神韻"概言其詩學要旨,誠不爲過。同時也應注意到,神韻詩學是王氏詩學,但王氏詩學不止神韻一説。王氏在順治時期的詩學活動、詩學主張也需納入研究視域,這對王氏詩學整體,乃至對清初詩風衍變的認識,都不無裨益。王氏早年學詩取徑多元博洽。王士禄、王士禛文中都提到過少時兄弟同和王、裴《輞川集》之事,這常被視作漁洋神韻詩的家學淵源。事實上,士禛"六七歲讀'燕燕於飛'詩,便棖觸欲涕。肄經之隙,私取《文選》、唐詩誦之,學爲五七言韻語"。[12] 這一反映更廣閱讀視

9　王士禛:《王士禛全集》,冊 1,頁 237。

10　據蔣寅考訂,王士禛最早以神韻論詩,在順治十三年間的《丙申詩序》中。見蔣寅《清代詩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第一卷,頁 621—622。

11　靳榮藩:《吴詩集序》,吴偉業撰,靳榮藩注:《吴詩集覽》,《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冊 1396,頁 346。

12　錢林:《文獻徵存録》,卷 2,《續修四庫全書》,冊 540,頁 81。

野的説法,在王氏自撰年譜中也得到了印證。順治時代王士禛"旁及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四唐之作"[13]的自叙,亦爲其沾染六朝、晚唐習氣添加注脚。位列"金臺十子"的曹禾評價王氏曰"先生之學非一代之學,先生之詩亦非一代之詩。其學何所不貫,其詩亦何所不有",[14]雖不無溢美,但王氏學詩不專一家則是實狀。

一個作家的接受史之成立,條件有二,一是作品輻射力大、潛能量多,二是社會需要,讀者有共感和認同。[15] 具體到李商隱,條件之一自不待言,《無題》詩即已説不盡,所設"未定點"足以召唤後人聚訟不已;條件之二則隨時代沉浮而非一成不變。王士禛早年"效義山體",步入温李一脉,有著深刻的現實背景因素。順治九年,王士禛鎩羽科場之際,是豔詩創作高峰期。據王士禄對此的描述之語,"貽上曾爲《香奩詩》三十章,又爲《續香奩》十章。……今集中所存'深閨怨語傳愁妾,樂府新詞賦惱公'諸篇是也。"[16]可謂風格鮮明,體量可觀。順治後期,王士禛常效温、李、韋莊詩,尤以效義山體見稱。漁洋認爲,"温、李齊名,然温實不及李"。[17] 王士禄除了和作香奩詩外,《無題效李義山體六首》、《無題詩擬李義山》、《無題效義山體二首》等詩也見二王旨趣。

與二王交好的彭孫遹,以骨妍詞媚而有"真得温李神髓"[18]之許。彭氏《無題同貽上作》十二首、《古豔詩》二十首、《金粟閨詞》百首,兹不詳析。值得注意的是,彭氏《戲答貽上》詩"賦得香奩最有聲,偶然托興寫傾城。道心近日清如水,不落人間薄幸名",[19]揭示了豔詩托興寓意的本旨。魏學渠爲彭王唱和集題序,有言"體同閨怨,妙等香奩,致光掩思,義山遜藻"。[20] 由義山到漁洋,撇開高下之辨不談,創作風格的承繼顯而易見。王士禛的效義山體,也實現了從字

13　王士禛:《自題丙申詩序》,《王士禛全集》,册 1,頁 531。
14　《王士禛全集》,册 1,頁 690。
15　高中甫:《歌德接受史(1773—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1。
16　王士禄:《十笏草堂詩選》,卷 5,《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册 98,頁 563。
17　王士禛:《花草蒙拾》,《王士禛全集》,册 4,頁 2478。
18　謝章廷:《賭棋山莊詞話》,卷 8,唐圭璋《詞話叢編》,頁 3421。
19　彭孫遹:《松桂堂全集》,卷 8,《清代詩文集彙編》,册 125,頁 96。
20　魏學渠:《彭王唱和序》,《彭王唱和詩》,卷首,清刻本。

句用典的襲用到人格精神的模仿。

李商隱長期沉淪下僚,無從改善遭遇,姑且以豔體排遣内心積鬱。於此形成視域融合,使得王士禛等人以義山體爲寫作範式。釋道源曾注義山詩集,王士禛《感舊集》援引道源之語,云"詩人論少陵忠君愛國,一飯不忘,而目義山爲浪子,以其綺靡華豔,極玉臺、金樓之體而已。第少陵之志直,其詞危。義山當南北水火,中外箝結,不得不紆曲其指,誕謾其辭,此風人小雅之遺"。[21] 包括王氏所引之語,道源的説辭"第一次從政治、道德和文學上對李商隱的人品、詩品作了高度評價"。[22] 王氏顯然是認同這一説法且效法而行的。甚至直至晚年,仍云"論世詩要蘊藉,又要旁引曲喻,使人有諷詠不盡之意。不可將舊事排説",[23]可見認同之深。王氏還非常重視因應不同的抒情需要而靈活選用不同詩人的風格作爲仿習範式,其稱"爲詩各有體格,不可泥一。如説田園之樂,自是陶、韋、摩詰;説山水之勝,自是二謝;若道一種艱苦流離之狀,自然老杜"。[24] 我們如果接續説"若道宦途失意之鬱,自是義山",應該也是合乎其認知和創作實踐的。蔣寅曾把王士禛指授後輩學詩的師法原則概括爲"就各體之宜,隨性分之近"。[25] 如今看來,這可以説是王氏平生審美體驗和創作經驗的總結。

明代長期以盛唐爲尊,嚴重壓制了晚唐詩歌的品次。李商隱詩在清代地位擡升的重要因素,一是從政治上重塑其人品,二是援引其"楚雨含情俱有托"之句,由寄托寓意闡釋豔詩,重塑了詩品。如王夫之所云,"義山詩寓意俱遠,從麗句影出,實自《楚辭》來",[26]即追溯至屈原"香草美人"式的寫法。釋道源亦以"風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27]譬喻義山詩,指其飽含寓意。而王士禛多次在著述中引用釋道源《義山詩注》之語,其於義山寓意寄托之説並不陌生。李王二人豔詩,有可溝通之處。王士禛在揚州期間的作品曾結集爲《過江集》,

---

21　王士禛輯:《漁洋山人感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卷 3,頁 241。
22　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頁 83。
23　王士禛、何世璂:《然鐙記聞》,張寅彭編纂、楊焄點校:《清詩話全編・康熙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冊 7,頁 4200。
24　同上,頁 4199。
25　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頁 64。
26　王夫之著、陳書良校點:《唐詩評選》,卷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218。
27　錢謙益:《注李義山詩集序》,《牧齋有學集》,卷 15,頁 704。

張九征爲之題序稱“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寄托”。[28] 王氏許爲知己之言，並在《居易録》、《香祖筆記》、《漁洋詩話》中反復提及此語，足見王氏之“寄托”獲得認同後，更被引以爲重。與宋初西崑派詩人的無病呻吟不同，王氏的義山接受，可謂是從形式到内容的全面接受。“隱藏在女性身後”有助於詩歌的間接性表達，尤其是對於那些紛繁複雜的情感表現。[29] 放眼清初，更能發現這一書寫範式的時代價值。

在王氏的文學生涯裏，從豔情與填詞、名士風流、宋詩新變，神韻論揚棄政治上邊緣、危險（諷喻）的傾向，整個過程隱含一種政治的馴服。[30] 清初文人轉而强調李商隱的寄托之説，實則爲自身張目。明末清初以降，由於易代之際的外緣背景，加上詩學内部的發展脈絡，“比興説詩”成了彼時詩壇主流的審美視野。[31] 由明入清的不少詩人都寫有一定數量的豔詩，在時代産生了巨變之後，在詩中容納進這一寄托的因素，從而使豔詩改頭换面成爲符合儒家詩論準則的一類詩作。[32] 遺民文人遭逢晚明亂世和朝代鼎革，其難隱之言、難言之隱，以有所托之豔體詩的形式外化於心。王士禛雖非遺民，但其在清初鎩羽科場、沉淪下僚的經歷也是鬱結於心而又不便直言之苦楚，故而以豔體紓解情緒。

此説並非與詩學王孟的路徑互斥。單由接受美學視角來看，神韻説意圖通過詩歌調動讀者想象力的用心是明顯的。神韻詩與無題詩都通過意象的隱喻性、多義性引發讀者無限遐思。[33] 相較於一般作品，朦朧詩（無題詩）與神韻詩都更爲重視讀者，刻意留白營造召喚結構。儘管不乏可溝通之處，但兩者的審美意涵顯然又有所區别。如果粗略用空間來形象的話，義山之蘊藉在於深邃，潛然其中；摩詰之神韻在於高遠，超然物外（筆者將另文詳論）。義山與摩

28　王士禛：《王士禛全集》，册 6，頁 4773。

29　Wai-yee Li.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4），p.14

30　楊玉成：《建構經典：王漁洋與文學評點》，載於林玫儀主編：《王士禛及其文學群體》（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 年），頁 209。

31　李宜學：《李商隱詩接受史重探》（新竹：臺灣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09 年），頁 227。

32　熊嘯：《明清豔詩初論》（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5 年），頁 183。

33　趙伯陶：《王士禛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前言，頁 6；賀琴：《王士禛豔體詩論》，《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6 期，頁 43。

詰終究還是分門別派,詩宗摩詰成爲王士禛尤其是中歲以後的顯著標籤。在揚州時期,王士禛鍾情義山,肆力豔詞創作。與此同時,就詩歌來看,"所謂神韻風格的代表作品都是在這一個時期完成的。毫不誇張地説,揚州期間是漁洋一生創作的頂峰"。[34] 在王士禛面前,義山與王孟這兩條路徑並行不悖,乃至交錯互通。[35] 這使得王氏揚州時期的詩歌和詩學都極具魅力。

二、詞體對義山詩的接受熱度

填詞化用唐詩,在兩宋已成風氣。許學夷《詩源辯體》稱"商隱七言古,聲調婉媚,太半入詩餘矣",並舉"柔腸早被秋眸割"等句,言其"皆詩餘之調也"。[36] 繆鉞曾撰《論李義山詩》,末尾指出"義山雖未嘗作詞,然其詩實與詞有意脈相通之處",[37] 惜未詳論。劉學鍇就此展開,闡發了義山詩的詞化特徵、義山詩對唐宋婉約詞的影響。可以補充的是,在填詞中興的清代,義山詩在清詞中依舊影響甚著。王士禛多以康熙詩壇盟主的形象爲後人所熟知,而在順治時代,王氏亦曾肆力填詞。在其所撰詞集、詞話,所編詞選中,李義山都是繞不開的人物。

在詞話《花草蒙拾》中,王士禛指出"詞中佳語多從詩出","孫巨源'樓頭尚有三通鼓',偶然佳興,然亦本義山'嗟予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38] 北宋孫洙《菩薩蠻・樓頭尚有三通鼓》寫歡宴正酣,緊急奉命赴官署應差時的牢騷和不舍。這與李商隱《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的情境結構幾乎完全類同,成爲以義山詩語入詞的典型。王士禛自作《尾犯・秋懷》詞,結句"女床鸞鶴"即化自義山詩《碧城三首》"閬苑有書多附鶴,女床無樹不棲鸞"句。女床是山名,作爲意象並不常見,王氏能信手拈來,可見其於義山詩的熟稔。彭孫遹

34　王小舒:《神韻詩學論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50。
35　吴留營:《删訂少作與風格轉向——王士禛與清初詩壇的變局》,《文藝理論研究》2025 年第 1 期,頁 115。
36　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年),卷 30,頁 288。
37　繆鉞:《詩詞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33。
38　《王士禛全集》,冊 4,頁 2480。

《倦尋芳・感舊》詞亦仿《碧城》，鄒祗謨評之曰“絶似玉溪生賦《碧城》詩，饒有對影聞聲之恨”。[39] 即便是評語，也化自義山詩句，可見其時風氣。

王士禛好友鄒祗謨在詞話《遠志齋詞衷》中有言，“詞至詠古，非惟著不得宋詩腐論，並著不得晚唐人翻案法。反復流連，別有寄托，如楊文公讀義山‘珠箔輕明’一絶句，能得其措辭寓意處，便令人感慨不已”。[40] 鄒氏所述，即北宋西昆體詩人楊億讀義山《宫妓》詩一事。《宫妓》詩的弦外之音，在於以宫廷歌舞隱喻政治生活，諷刺機關算盡、迎合邀寵的政治人物往往好景不長。楊億讀出《宫妓》詩的深妙寓意，爲之感慨。時至清初，鄒祗謨等詞人標舉義山擅長的寄托寓意之法，是李氏雖不填詞而常爲詞人所引重的緣由之一。

鄒氏在創作實踐中也多次借用義山詩中的話語、意象。如其《菩薩蠻・詠青溪遺事畫册和阮亭韻・彈琴》詞，結句“愔愔一夜長”（一作楚弄長），附有自注“李義山詩‘瑶瑟愔愔藏楚弄’”。[41] 義山此句出自名篇《燕臺四首・秋》。鄒氏和王士禛韻共作八首，《秘戲》一首有“流蘇閑掛笙囊緑”句，化自義山詩“緑繡笙囊不見人”，鄒氏自注亦有所交代，足見其對義山詩借鑒之頻。鄒氏這首詞，獲王士禛激賞，評曰“真是銷魂”。所謂的青溪遺事，指明清之交侯方域、李香君的才子佳人故事。而書寫此等題材，李義山正是當行好手，故而鄒祗謨在和韻中屢次引義山詩句及意象。朱彝尊亦曾指出風懷之作“玉溪生最擅場，韓冬郎次之”，[42] 進而探討追韓軼李的策略。

王士禛發起的青溪遺事唱和，使用追叙的筆調，所繪八個場境，雖然各富情調，處處是樂景，但畢竟東流去。從而在今昔對比中，寄予了對物是人非的滄桑世變、明亡清興的時代變遷的無限感慨。有論者曾指出，王士禛懷古詩中的感傷情緒的蕴結没有李商隱那麽深厚，也缺乏李商隱對社會癥結的敏鋭感受

39　鄒祗謨、王士禛輯：《倚聲初集》，卷 16，《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册 1729，頁 389。

40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653。

41　鄒祗謨、王士禛輯：《倚聲初集》，卷 4，《續修四庫全書》，册 1729，頁 253。

42　朱彝尊著，姚祖恩編，黄君坦校點：《静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年），頁 570。

和切膚之痛,他主要在直面時間之流的孤獨情緒中發抒悲涼的盛衰興亡之感。[43] 今就詞作來看,同樣適用。可以補充的是,王、李的身世經歷有別,作品中感傷情緒深淺不同,但二人所寫豔情,寄托寓意之法則有類同之處。

《倚聲初集》所收黄永《鵲橋仙・七夕》詞云:"今宵迎晤,明朝送别,烏鵲橋邊獨立。不如索性學姮娥,拚夜夜,廣寒孤寂。"[44]既然相守不能長久,與其忍受生離死别,不如像嫦娥一樣獨守月宫。王士禛作評曰,"義山詩'姮娥應悔偷靈藥'得非羨織女黄姑耶?"這同樣是義山《常娥》詩給出的未盡話題:織女羨嫦娥還是嫦娥羨織女。無論如何,詩詞都抓住了其中的愛情主題。《倚聲初集》收録的賀宿《好事近・春晚》,中有"夕陽醉起疑初曙,夢斷聞鶯語"句。[45] 鄒祇謨評語道:"夕陽醉起二語,與義山'醉起微陽若初曙,映簾夢斷聞殘語',今昔同工。"不難看出,賀詞明顯從李詩《燕臺四首》中衍化而來。可見李詩尤其是《碧城三首》、《燕臺四首》在詞體中的接受熱度。

王士禛好友彭孫遹《宴清都・螢火》詞中有"隋家宫苑何在?腐草於今無片影"句,[46]用以表達古今滄桑之感。附自注曰,"李義山《隋苑》詩'於今腐草無螢火'"。今考李詩題爲隋宫,可以指出的是,腐草、腐草爲螢這些意象並非李氏首創,《逸周書》即有此説法。義山之前,唐人引該意象入詩,已見慣熟。而彭孫遹詞越過先前諸家不提,直承義山《隋宫》詩句,可見其認知接受的選擇性。王士禛弟子宋元鼎《望梅・梅花》詞,有道"冰姿倩誰比潔,可荀爐熏麝,謝衣翻雪"。注曰"李義山《早梅》詩云'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爐更换香'"。[47]"荀令熏爐"、"謝衣翻雪"可謂常典,不止在義山詩中數次出現,即在劉禹錫、劉長卿、白居易、温庭筠等人詩中亦不鮮見。關鍵焦點就在於宋元鼎填寫該詞,選擇了以義山詩爲範式,而非其他諸家。鄒祇謨《惜黄花慢・詠晚菊》中的"紫雲新苑"一語,亦明言出自李商隱《野菊》"紫雲新苑移花處"句。歷來詠菊經典名

43　王利民:《綺麗餘波溉漁洋——論王士禛懷古詩與李商隱詩的淵源》,《社會科學輯刊》1997 年第 4 期,頁 135。
44　鄒祇謨、王士禛輯:《倚聲初集》,《續修四庫全書》,册 1729,卷 10,頁 315。
45　同上,卷 5,頁 261。
46　同上,卷 17,頁 408。
47　同上,卷 18,頁 420。

篇不勝枚舉，鄒氏采擇義山詩句入詞，亦體現其別有青眼。

綜上可見，李商隱雖不曾填詞，但清初詞壇對李商隱的接受是廣泛和客觀的。如薩莫瓦約所言，“借鑒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許的，是來自一段模糊的記憶，是表達一種敬意，或是屈從一種模式，推翻一個經典或心甘情願地受其啓發”。[48] 化用或仿作的出現，本身即是讀者期待視野和審美體驗的物化，自應是接受研究的觀照對象。王士禛及其詞壇同好對李商隱的接受何止於詞句、意象，亦至寄寓之法。以王士禛爲領袖人物，以揚州爲據點，成就清初首個規模大、陣容廣、自覺性高的聲勢盛壯的詞的活動中心，[49]文學史上向以廣陵詞壇稱之。“漁洋之數載廣陵，實爲斯道總持”，[50]其遍結同好，乃至左右時風。無論綺靡豔麗的風格還是托興寄意的寫法，都在文學史上留下印跡。時至乾嘉之際，張惠言以《詞選》濟浙西詞派之弊，所用正是比興寄托之説，爲詞體注入更富内蘊的美學價值。清末繆荃孫有言，“北宋之柳，南宋之辛，閨秀之李，國朝之二王，皆詞中大家，霑溉後學，獲益非淺”，[51]將王士禛與柳永、辛棄疾、李清照等人並列爲有影響力的山左詞人。“阮亭論詩以神韻爲宗，明清之間詩格爲之一變，而詞格之變亦自托阮亭之名始”，[52]況周頤此説也印證了王氏於詞史的意義。

三、義山接受的比較視野

接受美學的影響和接受研究批評，不僅要研究受影響者在哪些方面、如何接受影響，也要或更要研究受影響者如何選擇、改造這種接受和影響，以及作出這種選擇、改造的歷史背景、文化環境和個性特點。[53] 展示接受者或讚美、或

48　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
49　嚴迪昌：《清詞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頁 53。
50　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三，唐圭璋：《詞話叢編》，頁 3530。
51　繆荃孫：《石蓮庵刻山左人詞序》，《藝風堂文續集》，卷 5，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年），詩文一，頁 370。
52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 5，唐圭璋《詞話叢編》，頁 4510。
53　朱立元：《接受美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327。

批判的多面性,是題中之義。在接受者的比較視野中,可見出義山詩地位的升降。詩選或詞選是文學經典化的手段,也是藉以考察接受狀況的理想載體。在王士禛操刀的選集中,李商隱作品是否入選、采擇數量,王氏的選詩側重、評點如何,都是體現李詩被選擇性接受的直觀證據。

(一)評價義山在七言詩中的地位

康熙二十二年,王士禛纂輯《古詩選》,該書分五、七言兩部分。五言詩,於唐代只選了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這五人,李商隱未列入。七言詩,於唐代選了王維、李白、杜甫、韓愈等十幾人。李商隱附在韓愈名下,得入圍其中,且詩歌僅録一首。儘管如此,李商隱仍是被王氏選入七古詩選中的晚唐唯一詩人。

何人的詩歌佔據卷首?什麼樣的詩附録卷末?從王氏所輯《古詩選》目録來看,安排席次和控制數量是區分大家與名家的手段。就王維、李頎、高適、岑參、李白、王昌齡、崔顥等人七言詩的取捨來看,前四家"篇什尤多",岑詩之奇峭、李詩之豪放"更爲創獲",重視其對詩風的開創、引領作用。以此爲準繩,王昌齡、崔顥僅獲得"間取一二附之"的席次。對李商隱七古的地位評判,王士禛在《凡例》中有言:"杜七言千古標準,自錢、劉、元、白以來,無能步趨者。貞元、元和間,能學杜者惟韓文公一人。鈔韓詩一卷。李義山《韓碑》一篇,追配昌黎,附之卷末。"[54]在王士禛看來,得以入選的《韓碑》,與其説是李商隱的好詩,不如説是學杜、韓最成功的詩。在康熙四十年定稿的《居易録》中,王士禛論及七律體,有云:

> 同年劉吏部公戩云:"七律較五律多二字耳,其難什倍。譬開硬弩,只到七分,若到十分滿,古今亦罕矣。"予最喜其語。因思唐宋以來,爲此體者何啻千百人,求其十分滿者,唯杜甫、李頎、李商隱、陸游及明之空同、滄溟二李數家耳。[55]

54　王士禛:《漁洋文集》,卷 14,《王士禛全集》,冊 3,頁 1760—1761。
55　王士禛:《居易録》,卷 3,《王士禛全集》,冊 5,頁 3729—3730。

王、劉二人論七律，以開弩爲喻。在王氏看來，能開“十分滿”者，古今不過數家，而義山赫然在列。放眼中晚唐，義山獨步。有學者指出，王士禛與人唱和所作的香奩體都是七律，在詩歌形式上更多是接受了李商隱七律《無題》詩的影響。[56] 今以王氏“十分滿”的觀點對讀，又多了一分理解。

時至康熙四十七年，歸田居家的王士禛刊訂洪邁《萬首唐人絶句》而成《唐人萬首絶句選》。該選凡七卷，仍以五、七言分類編次。王氏在《凡例》中論七言詩，歷數王維、李白、王昌齡、王之渙等盛唐名家之後，有曰：“中唐之李益、劉禹錫，晚唐之杜牧、李商隱四家，亦不減盛唐作者云”。[57] 由七古與七絶的不同視角出發，李商隱的詩歌地位也有了較大差異。正是如此，在《絶句選》七絶部分，李商隱詩輯入 38 首，數量最多。《凡例》中提及的其他名家，杜牧詩入選 31 首，王昌齡 26 首，劉禹錫 25 首，李白 20 首，李益 14 首，王維 10 首，王之渙 1 首。就五絶來看，王維 22 首，劉禹錫 9 首，李商隱與李白各入選 8 首，位次第三。雖然各家創作總量多寡有別，但該數據仍有一定參考價值。綜合整部《絶句選》，全編不足千首，李商隱五七言詩共入選 46 首，數量第一，且遠遠超過位列其次者，打破了洪邁既定的格局。這印證了王士禛對李商隱詩“不減盛唐作者”的評價，是對李詩可堪爲範的肯定。

道咸間，歐陽勳《與羅秋浦丈論詩書》談道：“漁洋一代詩人，然古體獺祭似義山，無雄才真氣以運之；惟絶句允推正宗。”[58]此語信息量之大，本文不擬展開説。王氏的古體作法有義山堆砌之弊，可備一説。又如《筱園詩話》所指，“阮亭先生長於七絶。……以七絶神韻有餘，最饒深味”，[59]王氏的神韻詩傑作往往是七絶體。蔣寅也稱七絶是與神韻最爲有緣的詩體。[60] 而王士禛爲編次《唐人萬首絶句選》，歷覽唐人絶句，選入的李商隱七絶數倍於王維。這顯然不是無

56　鄔國平：《從香奩詩到神韻説——王士禛詩學的變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1 期，頁 63。

57　王士禛選、李永祥校注：《唐人萬首絶句選》（濟南：齊魯書社，2009 年），凡例，頁 1。

58　沈粹芬等輯：《清文彙》，丙集卷 2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年），頁 2808。

59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 3，張國慶選編：《雲南古代詩文論著輯要》（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頁 304。

60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頁 655。

心之舉。正是在刊訂《唐人萬首絶句選》的過程中,王士禛再次掀起了"效體"寫作,其中即包括義山詩。王氏認爲,晚唐李商隱等人的詩歌相對易學,絶句尤甚。這是作爲讀者的審美體驗,也是作爲詩人的創作經驗。故而七十五歲高齡、安度晚年的王士禛在刊訂唐人絶句之際,效法諸家,一年内竟成絶句二百首,同年所作古詩、律詩才有十分之一,絶異常態。

王士禛以《韓碑》爲李商隱古體之冠。"前代詩人不聞有推高之者,至阮亭乃取之以媲昌黎"。[61] 沈德潛《唐詩别裁集》於李氏古體亦只采此一首,且七絶與王氏《唐人萬首絶句選》相較亦多見重出者。薛雪《唐人小律花雨集》亦稱删自洪邁《萬首唐人絶句》,取義山詩數量高居榜首,與王氏之選有所呼應。如果結合沈氏《清詩别裁集》選漁洋詩最多,薛雪詩話對漁洋尊崇有加,不難理解二氏對漁洋觀點的吸收。翁方綱《七言律詩鈔》十八卷,唐宋金元詩人百餘位入選,唐代單獨成卷者少陵、義山、樊川三人而已。姚鼐《今體詩鈔》爲補漁洋《古詩選》體裁之闕,"取唐以來詩人之作……以盡漁洋之遺志"。[62] 該選也給予義山較高地位,義山七律入選數量僅次於少陵。

(二)接受並非一味尊崇

鄒祇謨《海棠春・閨詞和阮亭韻》有"春愁成曲"一語,並自注"李商隱有《春愁曲》"。[63] 事實上,《春愁曲》乃温庭筠之作,義山未曾賦此題。這一明顯訛誤,作者鄒氏、評者王士禛以及參訂者王士禧等人均視若無睹,似乎折射出温、李本一家的認知,以致於出現張冠李戴的情況。鄒、王等人肆力填詞,推崇綺麗之風,義山詩歌之接受是此背景下的一種表現,遠未達到顧此失彼、獨尊一體的一元化接受模式。

在《倚聲初集》中,王士禛評價王彦泓《滿江紅・憶》詞時説道:"次回豔情詩數百篇,刻畫聲影,有義山、致光所未到者。"[64] 王彦泓致力豔體創作,積衆家

61　姚範:《援鶉堂筆記》,卷 40,《續修四庫全書》,册 1149,頁 79。
62　姚鼐:《五七言今體詩鈔序目》,周中明點校:《姚鼐詩文集》(合肥:黄山書社,2021 年),頁 400。
63　鄒祇謨、王士禛輯:《倚聲初集》,卷 6,《續修四庫全書》,册 1729,頁 272。
64　同上,卷 15,頁 375。

之長，且有所發揮創新，清初即有人視其爲豔體詩的集大成者。王士禎認爲其對李商隱、韓偓有所超越之處，是客觀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由此也可側見，義山於漁洋，並非至高無上。鄒祇謨評論彭孫遹的《鶯啼序・夏景》詞，有言："此調惟君特、用修擅勝，然悉誇靡鬬多，以瑰麗爭長耳。羨門賦才俊逸，敷腴葱蒨，無一字語補湊。如以青蓮視玉溪，不無天人之別。"[65]鶯啼序爲詞體中最長的調式，結構與句式較複雜，歷來雖不乏作者，但佳作無多。鄒氏認爲吴文英（字君特）、楊慎（字用修）雖擅長此調，但失之誇靡，不如彭詞之俊逸。爲了説明這一點，鄒氏以李白、李商隱的差異進行類比，目之爲"天人之別"。李白逸思天馬行空，可謂"仙才"；李商隱詩專注人心，可謂"人才"，如此理解似無不妥。但以二李對舉，强調天人之別，仍有判别高下的意味。

彭孫遹在評點鄒祇謨《山亭柳・詠隋堤新柳》詞時也以李商隱作比。其云："觀程村此詞，覺義山'垂楊暮鴉'句寫得隋柳黯然無色。"[66]鄒氏筆下，春柳萬縷初柔、緑深黄淺，而李商隱《隋宫》所述"腐草無螢火"、"垂楊有暮鴉"應是秋景。兩者各爲不同主題服務，李氏以衰景寫滄桑之感，自然筆調黯淡。鄒氏該詞獲王士禎"風流可愛"的評價也恰如其分。但彭氏所評，容易讓人理解成李詩在鄒詞面前黯然失色。

如果説鄒、彭的上述評語對李商隱的詩褒貶參半、包含歧義，那麽如下評語則明白了當。蔣階《長相思・本意》詞有句云"來匆匆，去匆匆，夜半星光夜半風。相逢如夢中"，[67]鄒祇謨爲之評曰"義山'昨夜星辰昨夜風'更當退舍"。蔣詞脱自李詩，自不待言。蔣詞讀來更爲輕快暢達，但李詩含蓄凝重，有其朦朧之美。大可不必以"義山更當退舍"來抬高蔣詞地位。然而放眼詩詞評點傳統，這種攻其一點、對決高下的"生硬"方式又極常見。兹就《倚聲初集》來看，王士禎評鄒祇謨《惜黄花慢・詠晚菊用吴夢窗韻》詞時，云"得程村此作，古人（劉克莊等）坐失聲價矣"。[68] 評鄒氏《祝英臺近・旅懷用商文毅韻》詞時，甚至

65　鄒祇謨、王士禎輯：《倚聲初集》，卷 20，《續修四庫全書》，冊 1729，頁 451。
66　同上，卷 14，頁 363。
67　同上，卷 2，頁 228。
68　同上，卷 19，頁 423。括弧内爲筆者補注。

稱"柳三變、張三影何處生活"。[69] 此類評語飽含情感,褒貶與奪之中也夾雜遊戲成分。這在同時代人互評過程中表現得尤爲顯著。回歸本文主題來看,李商隱詩既在《倚聲初集》詞作中奉爲典範,屢被徵引,又在評點時常被戲筆點中,雅謔一番。而王士禛一向推崇的王、孟、韋、柳則無此遭遇,可見接受狀況的殊異。

如上觀之,無論是詩選還是詞選,王士禛操持選政時對李商隱詩青睞有加。由詩選來看,從《古詩選》到《唐人萬首絶句選》,王氏晚年對李詩愈加推崇,在整部《絶句選》中李詩遥居榜首,甚至打破了王氏推尊王孟、崇尚唐賢三昧的固有印象。就詞選來説,李詩一方面被視作絶佳詞料,另一方面則在詞人互評中成爲調侃對象,也從側面反映了王氏及其周圍詞人對李詩的熟稔。這本身是接受生態的鮮活體現。

四、再接受:一種開放延展模式

傳統觀點認爲接受理論似乎只關注以讀者爲中心的一個審美體驗過程,而當前的研究實踐則往往轉向兩個乃至多個過程。不僅要討論讀者如何接受作品,還要跟進身兼作者的讀者轉而如何進行新的創作。也就是説,過程中可能有前後兩個(多個)作者,前後多部作品。那麼,如此理解是否背離了接受美學理論呢?我們不妨重温姚斯的説法,"在閱讀過程中,永遠不停地發生著從簡單接受到批評性的理解,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接受,從認識的審美標準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産的轉換",[70]會發現接受本身蕴含著"新的生産"。有學者把對王士禛《秋柳》詩的考察,放在"不斷被接受"[71]的過程中,接受者顯然也包含了"新的生産者"。"第一個讀者的理解將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充實和豐富,一部作品的歷史意義就是在這過程中得以確定,它的審美價值

69　鄒祇謨、王士禛輯:《倚聲初集》,卷 14,《續修四庫全書》,冊 1729,頁 362。

70　H. R. 姚斯,R. C. 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4。

71　張宏生:《王士禛揚州詞事與清初詞壇風會》,《文學遺産》2005 年第 5 期,頁 90。

也是在這過程中得以證實”，[72]姚斯雖然拈出“第一讀者”的説法，但並未作明確界定。於此，陳文忠進一步豐富其意涵：“所謂接受史上的第一讀者，是指以其獨到的見解和精闢的闡釋，爲作家作品開創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礎，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讀者。”[73]姚斯所説的第一個讀者，顯然理解成第一個在理論上發揮影響的接受者更爲恰當。王士禛雖非李商隱詩歌的第一個讀者，但仍不失爲階段性接受史上的關鍵性接受者，甚至不妨視其爲這個特定階段中的“第一讀者”。藉由關鍵讀者而生發的接受現象，本文以“再接受”稱之。

前後代作家的交流取得的成果又會影響更後一代作家對前代作家的接受。[74] 王士禛主盟清初詩壇數十載，其對李商隱的特別關注和大量“效體”之作，在詩詞領域引發了較大反響。限於篇幅，兹從一斑以窺崖略。王士禛效元好問《論詩絶句》而成同名組詩，其中一首專門討論李商隱詩。詩曰：“獺祭曾驚博奥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年毛鄭功臣在，猶有彌天釋道安。”[75]李氏作詩用典既多且僻，有羅列之嫌，北宋楊億即謂之“獺祭魚”。讀者難以解讀義山詩之奥秘，學者也往往避而不敢注。王士禛拈出的《錦瑟》可謂義山朦朧詩中最爲典型的作品，足以映射全貌。元好問《論詩絶句》中論及義山詩，有云“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76]指出晚唐以來，義山詩尚乏注本這一現象。時至清初，釋道源箋注義山詩，猶如鄭玄曾爲《毛詩》作箋，故而王士禛《論詩絶句》以功臣視之。由元好問詩中的“無”，到王士禛詩中的“有”，李商隱詩歌接受在清初實現了突破性進展。“王士禛+李商隱”，形成新的召喚結構，引發了後續關於《錦瑟》（乃至義山詩）是否已解、如何解、解得如何等討論。

紀昀伯父紀邁宜途經河南境内，留宿盤豆驛時，有《滿江紅》詞一闋。李商

72　H. R. 姚斯，R. C. 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頁 25。

73　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64。

74　文浩：《接受美學的中國“旅行”：整體行程與兩大問題》（北京：知識産權出版社，2019 年），頁 120。

75　王士禛：《戲效元遺山論詩絶句》，《漁洋詩集》，卷 14，《王士禛全集》，册 1，頁 371。

76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卷 1，頁 56。

隱曾留宿此地,有《出關宿盤豆館》詩可證。故而紀詞開篇即道:"盤豆叢蘆,是當年、義山宿處。正夏景,煩襟暫滌,出關情緒。思子臺高悲已晚,玉娘湖冷愁誰訴。歎一篇、《錦瑟》解人難,閑情賦。"[77]此爲上闋,巧妙的是紀邁宜既把王士禛《論詩絶句》中的"一篇《錦瑟》解人難"嵌入詞中,更遥接義山原詩,盤豆、叢蘆、夏景、出關、思子臺、玉娘湖等語全自義山詩出,重組之後銜接自然,了無痕跡。並非孤例,紀氏另有《玉溪》詩寫道:"一篇《錦瑟》解人無,夢破驚弦淚迸珠。楚雨淒涼意何限,玉溪長傍玉娘湖。"[78]此詩與前詞意義相合,但更顯淒悵。王士禛詩中的佳句反復出現,已然傳爲經典。往深處追究,紀氏詩集中有"流水水窮臨水悟,義山、山谷、後山詩";[79]"瓣香詎可孤山谷,獺祭何妨效玉溪"等句,明確表達對義山詩的愛賞。更爲甚者,其云,"香山詩恬澹,有如鹽著水;義山詩工麗,有如花弄綺。……余於二公詩,瓣香深仰企。要當録成帙,百遍讀未已。"既能準確辨析香山、義山詩歌之别,又滿懷百讀不厭的情感。同時,紀氏於清代詩人,最服膺王士禛,與友人論詩時,將王氏"推爲本朝詩家第一"。正是如此,在前述詩詞中,紀氏將義山、漁洋二人佳句融爲一爐,成爲接受史上可堪重視的一種現象。

至乾隆時代,"王士禛+李商隱"模式下又有徐夔。徐氏與沈德潛共結詩社,初學韓愈,後轉向李商隱。《清詩别裁集》稱其"醉心義山,謂以男女會合喻君臣事使,得《風》、《騷》宗旨",交代創作旨趣之外,也提及徐氏"注義山詩,與朱長孺注互有異同,與惠定宇棟注王漁洋《精華録》,已經行世"。[80] 當今學界提及《漁洋精華録》皆稱惠棟箋注,似成共識。事實上,徐夔乃隱没的先行者。徐夔好友顧詒禄主持編纂的《長洲縣誌》也提到其"嘗箋注王尚書士禛《精華録》、李義山詩"。[81] 顧氏在《緩堂詩話》中,更具體談到了徐夔解《錦瑟》之事。其曰:"玉溪《錦瑟》詩,解者紛紜,究無定識。故新城先生謂'一篇錦瑟解人難'也。徐龍友夔所解,似得作者之意,曰:'此玉溪自傷遲暮,借錦瑟起興'云

77　紀邁宜:《儉重堂詩餘》,《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243,頁 665。
78　紀邁宜:《儉重堂詩》,卷 9,《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243,頁 598。
79　本小節所引,俱自紀邁宜《儉重堂詩》,分别見於頁 457、頁 515、頁 465、頁 507。
80　沈德潛等編:《清詩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卷 26,頁 1065。
81　顧詒禄等編纂:《(乾隆)長洲縣志》(乾隆十八年刻本),卷 25,頁 35a。

云。”顧氏不僅記録了徐夔的新解，還就教程夢星，獲得首肯，即“程午橋編修夢星方注《玉溪集》，余以此意質之，編修以爲然”。[82] 事實上，對讀二家注本，可知審美體驗仍有偏差，以致出現多解。

翁方綱《石洲詩話》以較多篇幅評騭王士禛的《論詩絶句》，尤其對“一篇《錦瑟》解人難”大加撻伐：“道源之注，朱長孺雖略採取之，何足當‘毛、鄭功臣’之目乎？”[83]釋道源箋本因未刊行，世人罕知。朱鶴齡在此基礎上成就了更爲完善的注本，流傳廣泛。誠然，即使要肯定道源之功，若將其不夠完善、影響有限的注本與鄭箋《毛詩》相較，也顯得地位懸殊，難以同日而語。翁方綱接續論曰：“且《錦瑟》一篇，遺山《論詩絶句》已有之。……以‘杜鵑’之‘托’説在前，而以‘華年’之‘怨’收在後，大旨了然矣。何庸復覓鄭箋乎？”言元好問已通過揭示“托”、“怨”二字，把《錦瑟》詩的意涵闡發明瞭，因而不必再用箋注。論述結尾，翁氏總體認爲漁洋此詩“於虚實皆無所據。故雖同以《錦瑟》篇作《論詩絶句》，而其與遺山相較，去之千里矣”。[84] 如此全盤否定，亦不免失之偏頗。漁洋肯定道源箋注，是回應遺山“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語。需要“鄭箋”，以無“鄭箋”爲憾事，此意出自遺山，而非漁洋。因此，翁氏攻擊的焦點實有偏差。整體而言，翁氏對漁洋詩學由服膺到批駁，學界已有探討，兹不贅述。單就此例來看，翁氏雖有微詞，但亦是義山詩歌“再接受”的一個生動場景。

《四庫全書總目》爲《李義山詩注》所作提要，同時提到元、王的《論詩絶句》。其中明確指出元好問詩中“以商隱爲西崑，殊爲謬誤”，對王士禛稱許的釋道源注本，也以批判爲主，“其書徵引雖繁，實冗雜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85] 在乾隆朝後期，章洠搜輯文獻，意欲注釋義山詩。其好友淩廷堪作書勸止，援引元、王二人論詩絶句，分析當下形勢。淩氏認爲，元好問“獨恨無人作

82　張寅彭編纂，劉奕點校：《清詩話全編・乾隆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册 6，頁 3299。

83　翁方綱著，陳邇東校點：《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卷 8，頁 243。

84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 8，頁 244。

85　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51，頁 2021。

鄭箋"的遺憾具有時代性,"此在當時,應發茲慨;若生今日,定無是説"。進而歷數明末以來諸家箋注已備,有云:"自明及今,時移事異,道林、長孺釋之於前,平山、午橋箋之於後。三首《碧城》,或窺初旨;一篇《錦瑟》,已得解人。"[86] 淩氏羅列諸家箋本,將王士禛"一篇《錦瑟》解人難"詩句化作肯定的説法,可視爲一段接受史的總結。

袁枚《隨園詩話》同樣提到"元遺山惜義山詩無人箋注,漁洋先生亦有'一篇錦瑟解人難'之句",[87] 以此爲鋪墊,推賞馮浩所注的義山詩集。直至清末,邱煒萲重提故事,曰"《錦瑟》一篇,自古本無確解。本朝何義門太史焯以意斷爲玉溪生自題其全稿之作。……王漁洋云'一篇錦瑟解人難',使見此解,又未知作何語"。[88] 今檢何焯《義門讀書記》,確有此説,但該説係何氏引自友人程廪年(湘衡)之口,且何氏並不以爲然。邱煒萲服膺《錦瑟》乃"自序其詩"的説法,認爲其解決了王士禛提出的"解人難"之困惑。

誠然,在清初李商隱詩歌接受史上,王士禛並非"專家",未曾如朱鶴齡、吴喬等人有箋注、評點專書。但以王氏詩壇地位之高,其在詩詞、詩話、选集、筆記等著述中數量可觀的"接受"史料,在當時及後世所産生的影響,似乎不比一部專書爲小。況且其"神韻説"不也是散見於各種載體而非專門系統呈現的嗎?王氏所言,在清代中後期不斷引發反響,成爲後人"再接受"的介質,亦成爲考察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的一條線索。

作品的經典地位不是作者本身即能完成的,所謂的經典化或去經典化,實質是讀者在持續發揮作用。如布魯姆所言,先前那種前輩詩人影響後輩詩人的慣常的因果關係其實並不確切,倒是前驅詩人往往受惠於後輩詩人的成就與光彩。也就是説,正是後輩詩人的成就與光彩使人們關注前輩詩人的詩作,使人感到了前人的偉大與不可或缺。[89] 王士禛對李詩的接受可爲此説充當注

86　淩廷堪:《復章酌亭書》,《校禮堂文集》,卷 22,紀健生校點:《淩廷堪全集》(合肥:黄山書社,2009 年),册 3,頁 181。

87　袁枚:《隨園詩話》,卷 16,王英志編纂校點:《袁枚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年),册 5,頁 594—595。

88　邱煒萲:《五百石洞天揮麈》,卷 7,《續修四庫全書》,册 1708,頁 184—185。

89　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312。

脚。元、王二人的論詩絶句,借助二人的詩壇地位及影響,將李詩進一步經典化。王士禛在清代李商隱接受中的作爲,補構了當前李氏接受史上的重要一環。王士禛作爲李氏接受史轉折期的"第一讀者"(或稱關鍵讀者),導引了後人的理解認知。筆者更願意將此類文學現象置於接受研究中去理解,而非影響研究中。"影響"應該用來指已經完成的文學作品之間的關係,而"接受"則可以指明更廣大的研究範圍。[90] 一篇《錦瑟》以及《錦瑟》代表的李詩,無論未解或者已解、再解,都使其成爲未完成的作品。而關鍵讀者之解,也疊加成爲後世"再接受"的介質和對象,連同李氏原詩,成爲生生不息的創作話題、接受話題來源,此話題開放且可持續。

餘　論

西方接受理論把批評的焦點轉向讀者,這對長期以文本和作者爲中心的研究範式是一種顛覆性的衝擊,其積極意義自然明顯。與此同時,接受理論也有矯枉過正之嫌,它仍未實現對文學活動全過程的統攝,其對作者的忽視就不斷引起詬病,甚至僅被窄化爲閱讀理論。筆者以爲,文學活動不僅要包括作家創作、讀者接受這兩個缺一不可的要件,而且還是循環的、持續的。讀者中包含新作者,他的接受活動既是對先驅作者的回應,也以新作品爲起點開啓新一輪的接受。舍此,談文學接受都難免割裂、孤立而與文學活動實踐有所隔膜。經由第一讀者到關鍵讀者,到讀者群;從接受到再接受,推動了作品的經典化。

王士禛向以尊唐、學王孟的面目爲學界所知,其更爲多元的詩學取向實有待發明。王氏晚年手訂全集,較之前集,無題詩、香奩詩大幅删削,所填詞作更是全部未收。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其隱没於李商隱接受史中。以致出現漁洋詩學即神韻詩學,神韻詩學即沖淡閑遠風貌的刻板印象。王氏在"學杜"視域中對義山詩的定位,效義山體與宗宋的關聯,王氏與同時代朱鶴齡、吴喬等人

90　烏爾利希・韋斯坦因著,劉象愚譯:《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47。

觀點的異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由此看來,重新發現王士禛在李商隱詩歌接受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具有必要性和可爲性。放眼開來,接受史中的關鍵讀者的軫轉作用及其遞傳資源值得深入開掘闡發。

(作者: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引 用 書 目

一、中文

（一）專書

H. R. 姚斯，R. C. 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

王士禄：《十笏草堂詩選》，《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9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年。

王士禛選，李永祥校注：《唐人萬首絶句選》。濟南：齊魯書社，2009 年。

王士禛輯：《漁洋山人感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王小舒：《神韻詩學論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王夫之著，陳書良校點：《唐詩評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元好問著，狄寶心校注：《元好問詩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文浩：《接受美學的中國"旅行"：整體行程與兩大問題》。北京：知識産權出版社，2019 年。

朱立元：《接受美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朱庭珍：《筱園詩話》，張國慶選編：《雲南古代詩文論著輯要》。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朱彝尊著，姚祖恩編，黄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年。

米彦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李商隱著，馮浩箋注，蔣凡標點：《玉溪生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吴偉業撰，靳榮藩注：《吴詩集覽》，《續修四庫全書》，冊 139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邱煒菱：《五百石洞天揮麈》，《續修四庫全書》，冊 17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沈粹芬等輯：《清文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年。

沈德潛等編：《清詩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年。

韋斯坦因著，劉象愚譯：《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

姚鼐撰，周中明點校：《姚鼐詩文集》。合肥：黄山書社，2021 年。

姚範:《援鶉堂筆記》,《續修四庫全書》,冊 11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紀邁宜:《儉重堂詩　儉重堂詩餘》,《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24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袁枚著,王英志編纂校點:《袁枚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年。
翁方綱著,陳邇東校點:《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高中甫:《歌德接受史(1773—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 年。
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年。
淩廷堪著,紀健生校點:《淩廷堪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9 年。
張寅彭編纂,楊君點校:《清詩話全編・康熙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
張寅彭編纂,劉奕點校:《清詩話全編・乾隆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
彭孫遹:《松桂堂全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彭孫遹、王士禛:《彭王唱和詩》。清刻本。
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
鄒祇謨、王士禛輯:《倚聲初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7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趙伯陶:《王士禛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
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
蔣寅:《清代詩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
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 年。
錢林:《文獻徵存録》,《續修四庫全書》,冊 54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韓偓著、陳繼龍注:《韓偓詩注》。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年。
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年。
繆鉞:《詩詞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嚴迪昌:《清詞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
顧詒禄等編纂:《(乾隆)長洲縣志》。乾隆十八年刻本。

(二) 論文

王利民:《綺麗餘波溉漁洋——論王士禛懷古詩與李商隱詩的淵源》,《社會科學輯刊》1997 年第 4 期,頁 135。

李宜學：《李商隱詩接受史重探》（新竹：臺灣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09 年），頁 281。

李宜學：《從〈無題〉詩論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對朱鶴齡〈李義山詩集注〉的接受》，《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2 期（2017 年 6 月），頁 125。

吳留營：《刪訂少作與風格轉向——王士禛與清初詩壇的變局》，《文藝理論研究》2025 年第 1 期，頁 115。

張宏生：《王士禛揚州詞事與清初詞壇風會》，《文學遺産》2005 年第 5 期，頁 90。

鄔國平：《從香奩詩到神韻説——王士禛詩學的變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1 期，頁 63。

賀琴：《王士禛豔體詩論》，《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6 期，頁 43。

楊玉成：《建構經典：王漁洋與文學評點》，林玫儀主編：《王士禛及其文學群體》（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 年），頁 209。

熊嘯：《明清豔詩初論》（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5 年），頁 183。

二、外文

Wai-yee Li.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Key Reader as Method: Wang Shizhen's Reception of Li Shangyin's Poetry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Literary History

Wu Liuyi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Wang Shizhen's theory of "*shenyun*" upholds Wang Wei and Meng Haoran as the highest models, seemingly forming a clear distinction from 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 (Yishan). Consequently,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ception of Li Shangyin's poetry, Wang Shizhen has often been overlooked. However, when examined through the poetic categories of "*xu*" (the intangible) and "*shi*" (the tangible), both Li Shangyin's misty poetry and Wang Shizhen's *shenyun* poetry present reality through absence and transform the tangible into the intangible, avoiding direct engagement with concrete events. Rich in meaning beyond words, a mere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ten reveals no specific person, event, or trace. Based on this shared aesthetic ideal, Wang Shizhen took Li Shangyin's poetry as a model for his own poetry and *ci* lyric compositions, a practice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his early and late works. During his tenure as an official in Yangzhou, Wang gathered like-minded peers and, capitalizing on the compilation of *Yisheng Chuji*, initiated critical discussions on Li Shangyin's poetry amidst a fervent trend of composing *ci* poetry on romantic themes. As a key reader, Wang Shizhen frequently referenced Li Shangyin in his writings, including poetry, *ci*, and critical works such as "remarks on poetry" (*shihua*) and "remarks on ci" (*cihua*). Owing to Wang's status a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literary world, these texts

exerted a broad and profound influence.

Keywords: Li Shangyin, Key Reader, Wang Shizhen, reception, Early Qing Poetics